

本刊的最新一期及全文存档可在 Emerald Insight 上查阅: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1368-5201.htm>

洗钱 澳大利亚赌场

约翰·朗代尔

文学院安全研究与犯罪学系
澳大利亚北赖德麦考瑞大学

洗钱
澳大利亚赌场

99

抽象的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澳大利亚赌场在洗钱和中国资本外逃中所扮演的角色。

设计/方法/途径 将澳大利亚赌场洗钱政府调查的报告和证据记录与对亚洲跨国犯罪的分析相结合。

研究发现 澳大利亚赌场的洗钱活动与跨国犯罪和中国资本外逃密切相关。一项核心发现是,博彩中介在洗钱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由于赌场使用了博彩中介和地下银行,而其中许多中介和地下银行与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中国大型犯罪集团关系密切,因此这些赌场尤其容易受到中国要员赌博市场犯罪活动的影响。

研究局限性/启示 关于澳大利亚赌场洗钱的信息非常少,这项研究依赖于过去两年政府就此主题进行的调查。

实际意义 作者将澳大利亚赌场洗钱问题置于亚太跨国犯罪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这对于正在应对瞬息万变的洗钱问题的联邦和州政府监管机构至关重要。政府调查已意识到洗钱与跨国犯罪相关,但缺乏时间和资源深入探讨这一主题。本文为州政府赌场监管机构和金融犯罪监管机构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视角,以帮助他们预测澳大利亚赌场未来面临的洗钱和犯罪压力。

社会影响 澳大利亚赌场洗钱活动对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我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关注跨国犯罪和洗钱问题。

原创性/价值 很少有研究探讨赌场与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

这项研究发现,澳大利亚赌场被用于洗钱,以转移非法毒品交易所得,并协助中国资本外逃。尽管政府严厉的调查迫使赌场加强了反洗钱管控,但由于来自亚太地区其他赌场的竞争压力,未来这些管控措施很可能面临放松。

关键词:赌场、澳大利亚、洗钱、跨国犯罪、中国、非法毒品
资本外逃,中国三合会组织

论文类型:研究论文

引言 亚太地区的

赌场数量迅速增长,部分原因是满足了中国赌客的需求。与此同时,跨国犯罪在该地区也日益猖獗。

© John Langdale.由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出版。本文根据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 (CC BY 4.0) 发布。任何人都可复制、分发、翻译本文并创作其衍生作品(用于商业和非商业用途),但必须完整注明原文及作者。完整许可条款请见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ces/by/4.0/legalcode>

《反洗钱控制杂志》第26卷第7期,2023年,
第99-109
页,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ISSN
1368-5201, DOI 10.1108/
JMLC-09-2022-0136



JMLC-09-2022-0136

该地区犯罪分子寻求更多洗钱途径,而这两种趋势的结合给该地区的赌场带来了严重的洗钱威胁。

我主要研究澳大利亚赌场的洗钱活动。近期,澳大利亚政府对赌场洗钱活动展开调查,这些活动与非法毒品贩运和中国资本外逃有关。虽然政府调查承认赌场洗钱与跨国犯罪相关,但国际视角在调查报告中并非重点,而只是次要问题。

赌场长期面临跨国犯罪的威胁:由于澳大利亚毒品使用率高,大量非法资金通过洗钱流入澳大利亚,而这些资金正是跨国犯罪所得。同样,由于澳大利亚是吸引中国移民的热门目的地,且赌场吸引了众多需要巨额资金的中国贵宾赌客,因此中国资本外逃在澳大利亚的现象十分严重。

赌场与严重的犯罪威胁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现金交易密集型行业,容易受到洗钱活动的侵害。赌场常被用于实施盗窃、欺诈、洗钱和其他犯罪活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2009,第25-26页]。VIP市场的犯罪威胁尤为突出,因为玩家通常会使用大量现金进行赌博,而这些现金的来源和最终所有权可能难以辨别,这使得犯罪分子能够将犯罪所得伪装成高额赌客的资金(Sharp,2020a,第35页)。

跨国犯罪在东亚地区迅速抬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9]。转移效应对非法毒品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打击犯罪的行动导致毒品生产转移到湄公河区域(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腐败国家。人们对与此类跨国犯罪相关的洗钱活动知之甚少。很可能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留在源头国和湄公河区域邻国,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洗钱。

更广泛地说,重大非法资金流动(IFF)在全球范围内以及亚太地区发生。非法资金流动被定义为资金跨境流动,其来源(例如腐败、走私和非法毒品)、转移(例如逃税和违反货币管制)或使用(例如恐怖主义融资)均属非法行为(Herbert,2020,第2页)。

中国资本外逃是亚太地区非法资金流动的主要领域之一。这些资本未必是在中国境内非法赚取的,但却违反了中国每年限制资金转移不超过5万美元的资本管制规定。富裕的中国人利用各种手段将资金转移到境外,其中地下银行是重要的转移渠道之一。

赌场赌博是富裕的中国人资本外流的一个常见原因。

本文旨在探讨:亚太地区跨国犯罪背景下澳大利亚赌

场洗钱的性质;赌场在促进中国资本外逃中的作用;以及亚太地区赌场之间的竞争。

背景:澳大利亚广

播公司(ABC)的“四角”(Four Corners)节目以及《时代报》(The Age)/《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尼克·麦肯齐及其同事的调查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澳大利亚赌场洗钱活动的担忧。这些报道是……的主要因素。

敦促各州政府对赌场洗钱活动开展调查。

我主要关注澳大利亚两家最大的赌场公司:皇冠赌场和星娱乐。皇冠赌场在墨尔本和珀斯经营赌场,并于2022年在悉尼开设了一家分店。星娱乐的营业额较小,在悉尼经营一家赌场,在昆士兰州经营两家赌场。

各州政府的赌场监管机构对赌场监管力度不足,更倾向于采用基于风险的模式。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解散了赌场管理局,并以独立酒类和博彩管理局取而代之,该机构负责监管该州所有博彩活动 (Bergin,2021,第37-43页)。然而,由于各州政府展开了严厉的调查,这种自由放任的监管方式已被放弃,各州政府也终于意识到有必要对犯罪猖獗的赌场行业进行监管。

澳大利亚反洗钱监管机构Austrac以及执法机构在处理与赌场相关的犯罪问题上收效甚微。这些机构面临着实力雄厚的赌场公司,这些公司积极游说州政府以推进其商业利益。此外,州政府缺乏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意愿;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扩大赌场带来的税收、就业和旅游业。

新南威尔士州针对皇冠赌场展开的伯金调查是澳大利亚首个也是最全面的调查 (Bergin,2021)。其他州的后续调查也借鉴了伯金调查的许多结论。伯金调查之后,维多利亚州进行了芬克尔斯坦调查 (Finkelstein Inquiry,2021),珀斯皇家委员会也于2022年成立。最近,星娱乐集团 (Star Entertainment)成为新南威尔士州贝尔调查 (Bell Inquiry,2022)的对象,而针对星娱乐集团昆士兰州业务的后续调查 (戈特森调查)预计将于2022年晚些时候发布报告。

我使用了政府委托对澳大利亚各州赌场洗钱活动进行的调查的证据记录和最终报告。这些调查中发现的洗钱和跨国犯罪问题,被置于亚太地区中国跨国犯罪的更广泛背景下进行分析。

亚太地区的赌场与中国国际博彩市场:亚太地区各国赌场为吸引中国国际博彩市场,尤其是贵宾博彩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国是国际博彩的巨大市场,因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国际旅游业经历了爆炸式增长。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博彩活动。出境游客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1.3亿人次,旅游消费额达1152.9亿美元。

中国曾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消费来源国。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旅行管制的放宽、旅游目的地的拓展以及低成本包机服务的兴起,都促进了这一增长 (Zhu et al., 2021, p. 1)。亚太地区国家一直是中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但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一国际旅游市场遭受重创。

中国国际赌客可分为以下几类:大众市场 (小赌客);高端大众市场 (中型到大型赌客);以及VIP 或豪赌客 (通常与博彩中介运营商有关,由其安排旅行、住宿和赌博筹码)。

JMLC
26.7

大多数犯罪问题都与赌博中介相关的VIP赌客有关。

澳门的赌场业务发展迅猛,到 2013 年博彩总收入达到 450 亿美元,2014 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88%。

此外,博彩收入占政府收入的83.5% (Liu,2015,第500-501页)。澳门的成功吸引了其他亚太国家效仿以博彩业为主导的旅游战略,希望借此吸引大量旅游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并为税收做出重大贡献。

102

2013年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澳门赌博相关腐败和犯罪的打击力度,尤其是在犯罪猖獗的贵宾厅市场 (Bromberg, 2020,第72页)。这一打击行动是促使该地区其他赌场寻求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因为中介运营商及其相关的贵宾厅赌客纷纷撤离澳门。

亚太地区的跨国犯罪、洗钱和赌场:我将澳大利亚赌场的洗钱活动与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跨国犯罪中的角色联系起来。我重点关注中国跨国犯罪集团,因为他们利用赌场洗钱的现象十分突出,尽管中国洗钱集团也为其他犯罪集团洗钱,并从中收取佣金[FATF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2018]。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2019年估计,亚太地区的冰毒市场价值在300亿至610亿美元之间。海洛因市场虽然有所下降,但规模仍介于9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 (UNODC,2019,第3页)。整体非法毒品市场,尤其是冰毒市场,可能仍在持续增长 (UNODC,2022)。非法毒品交易的巨额利润意味着该地区需要洗钱。赌场是洗钱的途径之一。

中国犯罪集团主导着亚太地区的跨国犯罪市场 (Felbab-Brown,2022)。澳大利亚与多个跨国犯罪网络有关联,这些网络通常涉及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犯罪集团 (McCarthy-Jones等,2020)。本文重点关注其中一个网络,该网络将澳大利亚与贩运冰毒的中国跨国犯罪集团联系起来。冰毒前体化学品从中国运往缅甸掸邦进行生产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第14页)。之后,这些毒品被贩运到澳大利亚。

2015年后,冰毒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缅甸掸邦,导致贩运网络向东南亚转移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9; Felbab-Brown,2022,第27页)。例如,2017年,泰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位列澳大利亚查获的冰毒主要出发地第二和第三位,而2015年,中国和香港则是走私到澳大利亚的冰毒的前两大出发地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9,第33页)。澳大利亚的冰毒市场主要来自缅甸,而非法毒品交易则由中国跨国犯罪集团控制 (Felbab-Brown, 2022,第28页)。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区域负责人道格拉斯指出,缅甸的甲基苯丙胺生产在扩大东南亚作为整个亚太市场来源地和过境地的作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澳大利亚作为目的地也占据了显著地位 (Parpart,2019)。

赌场内非法资金流动的中介机构 许多中国中介机构通过赌场进行非法资金流动。这些网络与澳门、香港和华南地区相连,通常利用地下银行渠道或哈瓦拉汇款网络。

博彩中介 博彩中介

是一群起源于澳门的中间人,旨在为中国贵宾赌客提供博彩活动便利,但已扩展到其他国家的赌场。

许多博彩中介与澳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 (Lo 和 Kwok,2017)。这些犯罪联系也随着博彩中介运营商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博彩中介是一群起源于澳门的中间人,旨在满足贵宾赌客的金融需求。由于多种原因,澳大利亚赌场运营商一直以来都非常依赖博彩中介来维持贵宾市场的持续成功:

中国对赌博推广的法律限制使得赌场必须依靠博彩中介来招募贵宾赌客;博彩中介在向贵宾赌客提供信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描述为小型银行;他们负责赌客的

债务,并承担着强制执行这些债务的角色 (Sharp,2020b,第4984页)。

大型平台博彩中介运营商通常在全球范围内运营,为中国VIP赌客在他们选择的任何赌场提供博彩服务。

此外,大型博彩中介已将业务多元化,开始拥有并运营赌场,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保留VIP赌客的业务,而不是与其他赌场分享 (Bromberg,2020)。另一个原因是,博彩中介模式在澳门面临监管威胁,因此他们正在转向其他业务。

与博彩中介相关的资金流动涉及漫长而复杂的价值链 (涵盖博彩和金融服务),这使得单一的报告实体难以了解交易目的或资金转移的受益所有权 (Austrac,2022,第477g段)。皇冠赌场的尼古拉斯·斯托克斯提供的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他认为,由于银行不愿参与与赌场的金融交易,赌场被迫使用汇款代理机构。这导致了高风险,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资金 (Stokes,2021,第367页)。

由于博彩中介人并不经常光顾赌场,风险进一步加剧,因为通常情况下,所有财务交易都是由赌场并不认识的中介人代表进行的 (Stokes,2021,第374页)。这些中介人经常在不同的中介人之间流动,这进一步增加了赌场运营商对其身份的不确定性 (Sharp,2020b,第5023页)。例如,一位名叫Simon Pan的中介人曾与皇冠赌场墨尔本赌场的多家中介人有过接触。Pan在墨尔本拥有一家妓院,媒体指控他与有组织犯罪和亚洲妇女人口贩卖有关联 (Sharp,2020b,第5029页)。此外,博彩中介人由股东和董事所有,而赌场大多并不认识这些股东和董事,这也带来了风险 (Stokes,2021,第375页)。其中一些股东很可能是澳门和中国南方的犯罪分子。

与中国跨国犯罪的联系 许多博彩中介运营商与有

组织犯罪有着密切联系。伯金调查报告 (Bergin Inquiry)对赌场进行了调查,重点指出了主要博彩中介运营商与非法毒品贩运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 (亚洲赛马联合会,2021年,第13页;伯金,2021年,第63页,第298页)。

在中国,由于赌债在法律上无法强制执行,非法活动在信贷提供和债务催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皇冠赌场实施了一项博彩中介策略来处理VIP玩家事务,这主要是因为皇冠赌场不必担心……

追讨债务,这些中介与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分子有联系,他们会追讨任何债务 (Bergin,2021,第 313-315 页)。

博彩中介人还利用地下银行将资金转移出中国,这种行为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此外,赌场博彩中介运营缺乏透明度,参与者匿名,且博彩中介资金的受益所有权、来源和分配情况不明,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Bergin,2021,第67页)。博彩中介人已将业务从澳门扩展到亚太地区的其他赌场,他们在整个地区运营非正式的资金转移系统,使得这些博彩中介人成为泛亚洲的非法赌博和洗钱组织 (亚洲赛马联合会,2021,第14页)。

伯金调查报告 (Bergin,2021,第303页)记录了非法毒品贩运组织、博彩中介和皇冠赌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其中,名为“公司”(The Company)的非法毒品贩运组织尤为重要。该组织由五个主要的中国犯罪集团组成,深度参与非法毒品贩运和洗钱活动 (Allard,2019; Parpart,2019)。据报道,“公司”在过去二十年中贩运到澳大利亚的毒品总量中占比高达70% (McKenzie等,2019)。

多家博彩中介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其中一位是墨尔本男子苏基·刘 (Suky Lieu),他因非法贩毒被定罪。刘的同伙罗伊·穆 (Roy Moo)于2013年因洗钱罪被判入狱。他被禁止进入墨尔本皇冠赌场,但仍代表该公司安排将资金洗回香港。他多次从皇冠赌场在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向香港中国银行转账 (Aspinall,2020,第5068页)。穆通过一家印尼博彩中介公司 Madam Ang Junket Group 的VIP账户进行洗钱,该公司雇佣了穆。此外,火锅博彩中介公司及其经营者吴志云 (Ng Chi Un)与该公司当时的负责人谢志乐 (Tse Chi Lop)有关联。这次公款旅行皇冠集团带来了数亿美元的营业额 (Bergin,2021 年,第 306 页; Sharp,2020b,第 5000-5002 页)。

海王星集团是一家大型博彩中介运营商,也涉嫌非法毒品贩运。与海王星集团有关联的多名人士与香港有组织犯罪有关,伯金调查委员会 (Bergin Inquiry)在梳理其错综复杂的股权结构时遇到了困难 (Bergin, 2021,第309页; Sharp,2020c,第5023-5024页)。此外,宋子海经营的一家博彩中介于2016年被控在中国经营非法赌博集团,但检方仍继续与其合作。

博彩中介、地下银行和跨国犯罪集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且缺乏充分记录的关联。例如,媒体曾报道,与星娱乐集团 (Star Entertainment)在昆士兰州布里斯班的赌场相关的企业利益存在犯罪联系 (Robertson et al., 2022)。特别是,由香港郑氏家族控制的柴大福集团是星娱乐集团在布里斯班新建赌场的合作伙伴。几十年来,柴大福及其关联公司一直与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有联系,尤其是与臭名昭著的澳门黑帮成员万国驹 (绰号“断牙”)关系密切,万国驹参与了东南亚多个赌场开发项目。

太阳城是全球最大的博彩中介运营商,但鉴于其前首席执行官周永康于2021年11月在中国因洗钱和其他犯罪活动被捕,其在澳门和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太阳城曾是皇冠星娱乐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据称,周永康与14K黑社会组织有关联 (Bergin,2021,第307页)。然而,太阳城的最终受益人是三合会成员香华强 (Sharp,2020b,第5004页)。

郑廷光是周的商业伙伴,也是 14K 三合会的成员,据称参与非法赌博、贩毒和洗钱活动 (Arnott,2022) 。

洗钱

伯金和芬克尔斯坦调查发现,有人用购物袋将成袋的现金带入太阳城赌场的“金库”。数十万美元的现金通过柜台流入,却无人核查现金来源 (伯金,2021,第235页;芬克尔斯坦调查,2021,第219页)。太阳城赌场的“金库”问题只是更普遍现象的一部分,因为大型平台中介运营商通常在赌场内设有独立的房间,导致监管严重失灵。这些房间实际上就是拥有自己员工的小型赌场。皇冠赌场对太阳城的运营缺乏反洗钱监管。

澳大利亚赌场

105

亚太地区赌场之间的竞争 亚太地区的赌场竞相争夺贵宾厅市场份额,尤其瞄准中国市场。2013年以后,中国反腐力度加大,促使各赌场更加努力地澳门吸引中国贵宾厅赌客。

澳大利亚赌场采取激进的竞争行为,从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其他赌场手中抢占市场份额。他们无视反洗钱责任和中国外资转移法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积极扩大贵宾市场的份额 (Bell,2022,第194页)。

2014-15 年,皇冠赌场制定了一项战略,将大型平台博彩公司引入澳大利亚。

皇冠集团的大股东詹姆斯·帕克利推这一策略,因为他看到该策略在澳门取得了成功。帕克的目标是使澳大利亚在国际贵宾博彩市场的份额翻三倍,并计划通过平台中介和与澳门大型赌场公司新濠博亚娱乐的合资安排来实现这一目标 (Sharp,2020c,第5056页)。皇冠集团推行这一策略的一大优势在于降低了其信贷风险,因为中介承担了贵宾赌客的债务。皇冠集团认为,其拟建于悉尼巴兰加鲁的贵宾赌场的未来成功取决于其国际贵宾业务的销售网络和中介运营商在推广皇冠悉尼方面所做的努力,即将其打造为一个面向贵宾玩家的综合度假村,并使其成为一个高端奢华的旅游胜地 (Bergin,2022,第15-26页,第242页)。此外,皇冠集团还派遣营销人员前往中国吸引赌客,这一策略违反了中国法律,导致19名员工于2016年10月

被捕 (Bergin,2021,第252页,第292页)。皇冠集团激进的博彩中介策略使澳大利亚面临来自中国的跨国赌场犯罪风险。

星娱乐集团 (Star Entertainment)也参与了博彩中介业务的竞争。2016年10月,皇冠赌场员工在中国被捕后,星娱乐集团得以从中国获得更多博彩中介业务 (Sharp,2022,第3989页)。星娱乐集团担心拟建的悉尼皇冠赌场会对其造成冲击,因为该赌场将只服务于贵宾赌客,因此星娱乐集团试图在皇冠赌场开业前尽可能地扩大其市场份额。

澳大利亚赌场通过促成中国资本外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允许贵宾赌客通过信用卡支付“酒店服务费”来获取赌博资金,而实际上大部分费用都用于赌博。中国银联卡禁止用于赌博,但皇冠赌场和星娱乐集团都无视了这一规定。皇冠赌场设计了一套中国银联卡交易流程,以规避中国的货币管制,并实现从中国非法转移资金。2012年至2016年间,中国富豪将高达1.6亿澳元的资金从中国账户转移到墨尔本的皇冠塔酒店,名义上用于酒店服务,实则用于赌博。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国的国际货币转移规则,也违反了澳大利亚的反洗钱法 (芬克尔斯坦调查报告,2021年,第2页)。

JMLC
26.7

106

星娱乐集团在其悉尼赌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2013年6月至2020年3月期间,星娱乐集团允许1307名顾客使用中国银联借记卡提取总计9.08亿澳元 (Bell,2022年,第1卷,第207页)。其中一位最大的用户李东芳 (Dong Fang Lee)频繁使用该卡,在2014年至2015年间提取了7000万澳元 (Sharp,2022年,第4148-4149页)。

尽管表面上这张卡是用来支付酒店费用的,但他从未入住过那家酒店。他没有用完收到的所有筹码,最后还兑换了一些,用中国银联卡像ATM机一样从中国向澳大利亚汇款 (Sharp,2022,第4026页)。

星娱乐发现,中国政府对中国赌客资金外流的限制日益严格,阻碍了其业务发展。星娱乐鼓励中国贵宾赌客将资金存入博彩中介公司观阁在澳门开设的银行账户,以绕过中国政府的限制 (Hawkins,2022)。之后,星娱乐在香港设立子公司EEIS,为顾客开辟新的支付渠道,以便他们将资金转移到澳大利亚进行赌博 (Theodore,2022)。然而,星娱乐并未对这些客户进行反洗钱检查。星娱乐利用EEIS向贵宾赌客提供信贷,其条款比该地区其他赌场提供的更具竞争力 (Theodore,2022)。

结论:赌场、洗钱与

跨国犯罪网络 澳大利亚赌场案例研究表明,赌场在跨国犯罪网络中扮演着洗钱的核心角色。中国洗钱者利用澳大利亚的赌场,将来自缅甸的冰毒非法贩运所得洗白至澳大利亚。洗白后的脏款被送往香港和中国南方。部分利润随后被用于购买制毒原料,以扩大跨国犯罪网络的规模。尽管其他洗钱手段也被广泛使用,但赌场确实为跨国犯罪网络的运作提供了便利。

与洗钱和犯罪丑闻相关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断了赌场的洗钱活动。澳大利亚赌场洗钱活动之所以受到影响,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中国博彩旅游业停滞,部分原因是公众对其运营的调查。这两个因素都导致皇冠赌场和星娱乐暂停了博彩中介运营商的业务。

赌场监管面临的长期难题在于,政府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赌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带来税收和旅游效益这一事实的影响。尽管目前澳大利亚各州的赌场公司已接受严格的反洗钱法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可能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放松相关规定 (Hatch,2022)。澳大利亚赌场监管的历史正是这种监管“弱化”的体现,最终导致犯罪活动再次涌入赌场。

亚太地区赌场之间的竞争 澳大利亚赌场与亚太地区的其他赌场争夺中国赌客。

然而,与澳大利亚的赌场相比,东南亚的赌场具有靠近中国市场的优势。东南亚国家新建了许多综合度假赌场,例如柬埔寨金边的金界世界 (NagaWorld)和越南的会亚纳 (Hoiana),这些赌场不仅提供高品质的度假设施,还提供博彩服务。湄公河地区的赌场 (例如缅甸的瑞科科赌场和老挝的国王罗马赌场)是臭名昭著的跨国犯罪和洗钱中心 (Gore et al., 2022)。湄公河沿岸的几个国家 (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腐败横行,犯罪猖獗。

跨国犯罪分子已经通过该地区的赌场洗钱巨额资金 (Douglas,2019; van Uhm 和 Wong,2021) 。

中国正在严厉打击澳门赌场,尤其是在博彩中介主导的贵宾厅市场。博彩中介正将业务转移到监管薄弱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湄公河地区(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些事态发展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赌场行业产生影响,澳大利亚赌场将面临来自东南亚赌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

此外,亚太地区的赌场也面临着在线赌场出现带来的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 (亚洲赛马联合会,2022;道格拉斯,2022) 。

澳大利亚政府对赌场洗钱问题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与犯罪活动相关的国内问题上。虽然也考虑了跨国犯罪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和时间限制,调查范围受到限制。尽管调查面临的时间和资源限制可以理解,但由于未能审查亚太地区赌场面临的跨国犯罪和洗钱问题,其调查结果存在局限性。

显然,各州的监管管辖权仅限于其所在州。然而,监管必须结合赌场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和跨国犯罪形势来制定。赌场在贵宾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许多贵宾赌客来自海外,尤其是中国;这些赌客会受到各种诱惑,前往亚太地区不同的赌场进行赌博。

亚太地区的赌场、非法汇聚点和网络:与澳大利亚赌场相关的非法资金流动网络只是亚太地区更广泛的非法网络的一部分。人们对这些非法资金流动网络的规模、增长和范围知之甚少。此外,由于犯罪分子会根据市场机会做出反应,并且会避开执法力度较大的地区,这些网络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香港和华南地区在亚太地区诸多非法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枢纽角色,包括非法毒品交易、非法野生动物贩运和假冒商品交易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3年,第55页;野生动物司法委员会,2020年;欧洲刑警组织,2017年,第18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拥有一批精于促成与中国内地及亚太市场进行非法和合法交易的商业和金融中介机构。

香港/澳门是亚太赌场行业非法资金流动 (IFF)的关键枢纽。该地区是中介机构 (尤其是博彩中介和地下银行)的中心,这些机构为赌场行业的非法资金流动提供便利。然而,打击腐败和犯罪的行动正在导致澳门博彩中介的转移,许多中介机构转向监管不力的湄公河地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目前尚不清楚澳门和香港这一传统枢纽的未来角色将如何。

人们对活跃于香港、澳门和华南地区的主要犯罪集团知之甚少。媒体报道指出,“公司”(又称“三哥集团”)是由五个主要的中国犯罪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这些组织主导着亚太地区的非法毒品贩运 (Allard,2019)。这些犯罪集团中的许多都在亚太地区的赌场和博彩中介运营商中拥有投资,并且是这些赌场的主要客户。

澳大利亚赌场面临着来自该地区跨国犯罪的长期威胁。非法吸毒者是贩毒组织的主要客户,而这些毒品销售所得需要通过国际渠道洗钱。

JMLC
26.7

拉丁美洲的非法毒品贩运集团在亚太地区日益活跃,它们或独立扩张,或与中国犯罪集团结盟 (McCarthy-Jones 等,2020)。中国洗钱集团在北美已经证明,它们能够以低成本洗白非法毒品销售所得 (Langdale, 2021)。它们很可能在该地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利用与赌场的现有联系来洗白非法毒品贩运所得。

108

参考

Allard, T. (2019), “‘像一家全球性公司一样’ :追捕亚洲的埃尔·查波”,《悉尼先驱晨报》, 10月16日。

Arnott, S. (2022), “证据记录,Adam Bell SC 对 Star Ltd 的独立审查”,4月4日, 悉尼。

亚洲赛马联合会 (2021 年),“新冠疫情期间非法赌博增长报告”,香港打击非法赌博及相关金融罪案委员会,5月。

Aspinall, S. (2020 年 11 月 6 日),“Bergin 调查公开听证会,协助调查的律师”,悉尼。

Austrac (2022 年),“索赔声明”,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悉尼,3月1日。

贝尔,A. (2022),“根据赌场管制法第143条和第143A条对星港有限公司的调查进行审查” 1992 年 (新南威尔士州)”,8月31日,悉尼。

Bergin, PA (2021),“报告.根据 1992 年《赌场控制法》(新南威尔士州)第 143 条进行的调查”,悉尼。 第一卷。

Bromberg, P. (2020),“提交给新南威尔士州的证据记录”,赌场调查,2月24日,悉尼;Douglas, J. (2019),“亚 洲有组织犯罪加倍投入赌场”,CNN Wire,2月14日。

Douglas, J. (2022),“新冠疫情如何迫使东南亚赌场犯罪分子押注科技 并取得胜利”,《南华早报》,8月7日。

欧洲刑警组织 (2017),“欧盟假冒和盗版情况报告”,联合项目 与欧盟知识产权局 (布鲁塞尔)合作。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2009 年),“赌场和博彩业的脆弱性,与亚太反洗钱小组合作”,FATF 报告,亚太反洗钱小组,巴 黎。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2018 年),“职业洗钱”,巴黎。

Felbab-Brown, V. (2022),中国与合成毒品管制: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和 先驱者,布鲁金斯学会,华盛顿特区。

芬克克斯坦调查 (2021 年),“皇家委员会关于赌场运营商和许可证的报告”,墨尔本,第 1 卷。

Gore, A.,Kennedy, L.,Southern, N. 和 van Uhm, D. (2022),《亚洲轮盘赌:东南亚的犯罪赌场和环境商品非法贸易》,全 球打击跨国犯罪倡议,日内瓦。

Hatch, P. (2022),“‘欺骗、犯罪、被摧毁的生活’:澳大利亚是如何在赌场赌博中失败的”, 《悉尼先驱晨报》,4月1日。

Hawkins, G. (2022 年 4 月 29 日),“证据记录”,Adam Bell SC 对 Star Pty Ltd 的独立审查,悉尼。

Herbert, G. (2020),“中国与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法资金流动”,英国政府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K4D 服务台 报告,伦敦。

Langdale, J. (2021),“中国在北美的洗钱活动”,《欧洲有组织犯罪评论》 犯罪,第 6 卷第 1 期,第 10-37 页。

Liu, MT, Chang, TTG, Loi, EH 和 Chan, ACH (2015), “澳门博彩业:当前挑战和未来十年的机遇”, 亚太市场营销与物流杂志,第 27 卷第 3 期,第 499-512 页。

Lo, TW 和 Kwok, SI (2017), “澳门赌场中的三合会组织犯罪:法外治理和创业精神”, 《英国犯罪学杂志》,第 57 卷,第 589-607 页。

McCarthy-Jones, A.,Doyle, C. 和 Turner, M. (2020), “从等级制到网络:国际毒品贸易的组织演变”, 《国际法律、犯罪与司法杂志》,第 63 卷,第 1-11 页。

McKenzie, N.,Toscano, N. 和 Tobin, G. (2019 年 7 月 27 日), “黑帮、赌徒和皇冠赌场:这一切是如何出错的”, 《悉尼先驱晨报》。

Parpart, E. (2019), “冰毒威胁”, 曼谷邮报,11 月 18 日。

Robertson, J., Willacy, M., Hui, E., Taylor, J. (2022), “昆士兰州政府认可香港一家与中国三合会有关联的公司持有星港城股份”,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8 月 22 日。

Sharp, N. (2020a), “Bergin 调查公开听证会”, 协助调查的律师,1 月 21 日,悉尼。

Sharp, N. (2020b), “Bergin 调查公开听证会”, 协助调查的律师,11 月 5 日,悉尼。

Sharp, N. (2020c), “Bergin 调查公开听证会”, 协助调查的律师,11 月 6 日,悉尼。

Sharp, N. (2022), “Star调查公开听证会”, 协助调查的律师,5月31日,悉尼。

Stokes, N. (2021), “向调查作证”, 芬克尔斯坦调查,墨尔本,4月25日。

Theodore, H. (2022), “在 Star Pty Ltd 独立审查中的证词”, 4 月 29 日,悉尼。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3),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曼谷。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9), 东南亚跨国有组织犯罪:演变、增长和影响,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曼谷。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20 年), “东亚和东南亚的合成毒品:最新进展和挑战”,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曼谷。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22 年), “东亚和东南亚的合成毒品:最新进展和挑战”,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曼谷。

van Uhm, DP 和 Wong, RWY (2021), “中国有组织犯罪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金三角的多元化和外包”, 《有组织犯罪趋势》,第 24 卷第 4 期,第 486-505 页。

野生动物司法委员会 (2020 年), “规模扩大:工业规模贩运的快速增长” 穿山甲鳞片”, 荷兰海牙。

朱建军、艾瑞、西里蓬 (2021), “中国出境旅游: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视角”, 旅游研究年鉴,第87卷,第1-11页。

延伸阅读:Kennedy,

L. 和 Southern, N. (2022), “东南亚赌场骗局群岛内幕”, 《外交官》杂志, 8月2日。

通讯作者 John Langdale 的联

系方式为: john.langdale@mq.edu.au

如需了解如何订购本文的重印版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meraldgroupublishing.com/licensing/reprints.htm或联系我们获取更多详情: permissions@emeraldinsight.com

洗钱

澳大利亚赌场

109